

梁啟超對抗帝國主義策略的轉變

黃春興 1997/10/15

摘要：

一九〇三年，梁啟超由支持共和革命轉而推動君主立憲，本文探討文獻在研究該問題時所忽略的經濟學角度。在遊新大陸之前，他認為托辣斯只是西方社會尚未克服的弊端；之後，他觀察到美國政府已接納托辣斯，更與其新興帝國主義結合。這影響到梁啟超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轉變之後，他認為中國的救亡圖存必須依靠國人經營能力的重建和資本的加速累積，因此，經濟政策的選擇優先於政治體制的選擇。

第一節 前言

一九〇三年是梁啟超政治言論轉變最大的一年，他由支持共和革命轉而推動君主立憲。由於時間剛好是在他遊新大陸之時，近代史學者便提出有趣的問題：新大陸之行是否導致他轉變的主要原因？若是，他到底在新大陸看到什麼？若否，他為何要選在這時點調整自己的政治態度？背後的影響因素又是什麼？對此問題，張朋園（1964）最早提出有系統的解釋，之後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他們的修正與補充見解。¹ 然而，除Chang（張灝，1971）外，文獻的討論大都以非經濟因

¹ 張朋園（1964）提出五點因素說明梁氏的轉變，包括：梁氏與康有為的師生關係、畏懼破壞之後難建設、與革命黨關係惡化、受英國學者占士布利斯（James Bryce）的影響而醉心於英式君主立憲政治、受黃遵憲的影響而趨向保守。元冰峰（1966）提出兩點修正：梁氏流質易變的個性容易讓外界變數成爲影響他轉變的觸媒、從美國華人身上感嘆國人「只能受專制，不能享自由」。潘英（1988）認爲梁氏在新大陸之遊使梁氏對美國的共和民主開始感到失望，而自立軍的失敗正好提供他遠離革命的機會。更詳細的文獻回顧，請參考黃克武（1994）。

素為主²，對重視生計學（經濟學）的梁啓超保留一些未探索的空間。

根據張灝的分析，梁啓超在新大陸之行中發現美國的快速工業化、帝國主義的擴張行動、及托辣斯的興起之間存在著「制度性的關連」(institutional tie)，並了悟到托辣斯在二十一世紀的主宰勢力。³ 張灝從而相信梁啓超在一九〇三年的轉變，主要是受到這些第一手的觀察所震撼。⁴ 然而，誠如黃克武 (1994) 所引述，張文試圖說明梁氏的轉變是「早已潛伏在他思想裡頭之基本傾向的終極發展」。如此一來，梁氏的新大陸之行成爲加速他言論轉變的催化劑，並不帶來任何的新意。⁵ 這樣的推論是不易令人滿意的，因爲在梁氏遊新大陸之際，美國正在醞釀近代史上的兩大事件。首先，早期反托拉斯法案 (the Sherman Anti-Trust Act, 1890) 在歷經Melville W. Fuller、Oliver Wendell Holmes 等大法官，極力以司法權阻止聯邦政府侵入州政府的反托拉斯權利的努力後，到了二十世紀開始，其優勢已逐漸爲聯邦政府（行政權）所左右。到了一九〇四年，聯邦政府終於在「西北控股公司對美國」(Northern Securities Company v.s. United States) 一案中，以五比四的險勝比數獲得可以直接管理各州托辣斯的權力。⁶ 其次，當迪奧多·羅斯福 (Theodore Roosevelt) 繼任美國總統之後，不僅一再擴張聯邦政府的權力，更積極地將傳統向西部推進的領土擴張行動轉化爲對海外的擴張行動，並於一九〇四年正式宣佈美國「必須」承擔保護文明世界在美洲之投資責任的所謂「羅斯福推論」(Roosevelt Corollary)。⁷ 在《新大陸遊記》(以下簡稱《遊記》) 中，我們似乎可感覺到梁氏當時已經嗅出了這些即將發生的大事件。

² 以梁啓超的經濟思想或經濟政策爲主要論述對象的文獻並不多，趙靖與易夢虹(1980)、李宇平 (1991)、Trescott 與 Wang (1994) 等是少數的例外。這原因或許如張朋園所說：「我...研究社會變遷和政治發展都可以應付，最難的是經濟學一門」(張朋園，1997：40)。

³ Chang, 1971：244。

⁴ Chang, 1971：245。

⁵ 張灝明白地指出：梁氏在看到托辣斯之後而連想到它對中國的威脅，「對梁氏而言並無新意」(Chang, 1971：245)。然而，整個的新大陸之行對梁氏是否具有無新意？張文對此並未有較清楚的交代。

⁶ Ely, 1995：127-134。

⁷ Palmer 與 Colton, 1984，中譯本：220。

因此，本文將循著張灝關注托辣斯與美國帝國主義間之關連性的線索，進一步突出上述兩事件對梁啟超的影響。簡單地說，本文認為梁氏到了新大陸之後，才真正了解到美國新興帝國主義的威脅，在於它結合了軍事強權與托辣斯 (trusts) 的龐大資本，企圖以投資壟斷的方式替代以往的武力征服，以無形的政經掌控替代有形的兼併。於是，在對抗帝國主義的策略上，他開始把經濟問題的重要性置於政治問題之上，視資本累積與利用的幣制金融問題較商品的生產問題重要。

現有文獻在討論這問題時也常指出：梁啟超在遊新大陸之後，便失去中國人具有施行民主共和之政治能力的信心。其實不僅於此，梁氏同時也失去中國人具有經商能力的信心。⁸ 不幸地，在他看來，當時不論是孫中山的共和革命或是康有為的尊君立憲，都只看到國人政治能力之不足，卻無知於國人經營能力的喪失。就此而言，轉變後的梁啟超，其救亡圖存的有效策略不僅不同於孫中山，也異於康有為。那麼，他為何要選擇回到康有為的陣營？我們可以假設梁氏在自立軍失敗之後，便失去獨撐一面的政治資源，不得不明確地在孫中山與康有為之間有所抉擇。若比較此二者，孫中山是個社會革命者，其鼓吹的分配公平政策不僅無助於國人經營能力的重建，更有害於資本的累積；至於康有為的尊君立憲，雖然也缺乏重振國人經營能力的內容，但至少還留有開明專制這一條路可走。梁氏認為中國歷史上的管仲，便曾在開明專制的體制下，成功地施展了一套即使是西方列強都比不上的幣制金融政策，將齊國人帶入強盛的帝國境地。為了向國人表明他的新認識與選擇，梁啟超先後發表《開明專制論》及《管子論》兩書，分別討論政治及經濟方面的策略。他在後書的表白，不僅較前書更為清楚，甚至到了

⁸ 梁啟超在一八九七年所寫的〈史記貨殖列傳今義〉一文中還認為：只要重新拾回《管子·輕重篇》和《史記·貨殖列傳》的思想，「昌明其義，而申理其業，中國商務可以起衰」。(《史記貨殖列傳今義》，《飲冰室文集》，以下簡稱《文集》，第二冊：36) 一九〇三年初，當他剛抵加拿大時，他也還認為：「華人商務之才，過於日人甚遠。…(然)有此天才，而不知擴充故也。」(《新大陸遊記》，《飲冰室專集》，以下分別簡稱為《遊記》與《專集》，第二十二冊：5) 但是，當他遊歷紐約，見到華人只從事洗衣和餐館事業之後，他的信心發生了動搖。他嘆到：「可見，謂中國人富於商務之才者，亦誣甚矣！」(《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46)

借管子以明志的地步。⁹

本文各節安排如下：除了本節外，第二節將回顧梁啓超對美國帝國主義之興起的看法、第三節將討論美國政府與托辣斯間的關係、第四節將略述梁啓超對抗此新興帝國主義的策略。在第五節的結論中，我將借用梁氏兩度入閣所擬的政策計劃來檢證本文的說法。

第二節 梁氏筆下的美國帝國主義

早在遊新大陸之前，梁啓超就已經稱美國當時的領土擴張行爲是帝國主義，並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中將它與英國、德國、俄羅斯並列爲當時行帝國主義的代表國家。同時，梁氏也使用了當時一些美國人在反對自己國家走上帝國主義所採用的「美國帝國主義」的類似詞，稱「門羅主義，實美人帝國主義之先河也」。¹⁰

一九〇三年，當梁啓超遊新大陸時，美國正處於帝國主義的巔峰時期。在此之前，也就是一八九八年，美國才打敗西班牙，並在巴黎合約中接收菲律賓、關島、波多黎各等原爲西班牙的屬地。一九〇〇年，美國趁北京發生義和團之亂，自菲律賓派兵參與「八國聯軍」，正式介入中國事務。這時，梁啓超已逃赴日本，致力吸收西方思想。一八九九年到一九〇〇年間，他曾前往已成爲美國屬地的夏威夷。一九〇一年，美國總統麥金利 (William McKinley) 被刺身亡，雄才野心的副總統羅斯福接任總統職務。

當梁啓超抵達溫哥華後不久，便在報紙上讀到美國羅斯福總統在巡行太平洋沿岸時的演說稿。其內容大要是說：美國爲了謀子孫的百年大計，「舍帝國主義

⁹ 在《管子傳》中，梁啓超強調管子區分國家與君主的智慧，並取《管子·大匡篇》的「初定謀」與「將返國」兩段故事加以說明。他說道：「夫君與國截然本爲二物。君而爲愛國之君也，則吾固當推愛國之愛以愛之；而不然者，二者不可得兼。先國而後君焉，此天地之大經、百世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管子傳》，《專集》，第二十八冊：7）

¹⁰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22。

其末由也」。要走上帝國主義這一條路，美國就必須搶先占有太平洋的優勢權；而環顧當時世界各國，也唯有美國擁有開拓太平洋優勢權的能力。¹¹ 對於這份演講稿，梁氏在《新大陸遊記》中寫下這樣的感言：

吾在報中，見羅斯福此演說文之後，吾怵怵焉累日，三復不能去焉。夫其曰執世界舞臺之大役、曰實行我懷抱之壯圖，其「大役」、「壯圖」之目的地何在乎？願我國民思之。¹²

毫無疑問地，當美國新帝國主義以太平洋為基地後，位於太平洋彼岸且是羅斯福口中「老死垂朽」的中國，自然成為它侵略的主要「目的地」。由於這篇演講稿興起梁啟超對新帝國主義的警覺心，他盼望「吾國人猛省」。

五月十七日，梁氏到白宮拜訪羅斯福。然而，他卻只用三行文字簡單地交代會晤內容，就轉去討論美國門羅主義的發源與轉變。同樣地，他也轉載一段羅斯福在芝加哥的演講稿，再度向國人提出警語。¹³ 五月二十三日，他造訪費城海軍造船所，也在詳細報導美國海軍的發展之後，第三度向國人提出警語。¹⁴ 這些警語看起來似乎都是針對羅斯福的野心而發的，但他並不認為美國新帝國主義的興起只是出於羅斯福一人的野心；相反地，他認為「美國自麥堅尼以來，共和黨即已傾心於帝國政略」¹⁵，「亦可見此主義為全國之公言，而非一人一黨之私言矣。」¹⁶ 他在敘述門羅主義的轉變過程時，也清楚地表達他的憂慮。¹⁷

¹¹ 《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8-10。

¹² 《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11。

¹³ 根據梁啟超的引述，羅斯福總統的演講內容大致是說：門羅主義雖然未能成為國際公法，但是這無所謂，只要美國人民具有「遠志與實力」，然後「攜盾而行」，自然「門羅主義所向無敵」。說到這裡，梁氏向國人發出他的第二度警語，說到：「吾讀此演說，三復其「門羅主義所向無敵」一語，吾不禁瞿然以驚，而未測羅斯福及美國國民之本意何在。...嗚呼，可以思矣。夏威夷為郡縣，若不闕秦，將焉取之？吾恐英國鴉片煙之役、法國東京灣之役、德國膠州灣之役，此等舉動，不久又將有襲其後者也。」（《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60）

¹⁴ 他說到：「嗚呼！門羅主義所向無敵、門羅主義所向無敵，豈其將已知向歐洲而行門羅主義之正反對耶？而汲汲焉何為？我同胞一念之。」（《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77）

¹⁵ 《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58。又，當羅斯福在演講中提到「帝國主義」的字眼時，梁氏便在底下註加「鼓掌」兩字。（《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9）

¹⁶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22。

¹⁷ 梁啟超說到：「八十年來，隨著美國國勢之進步，而此主義亦日變其形。...所謂『亞美利加

雖然梁氏在〈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中已經預見美國帝國主義之興起，但由於該文乃是根據日文的一些譯本及著本所改寫，其資料未超出美國麥堅尼總統的作為，亦未涉及羅斯福的野心。一九〇四年十二月，羅斯福正式在美國國會宣佈所謂的「羅斯福推論」，將美國帝國主義推到最高點。這時梁氏已返回日本住所。根據梁氏的〈自序〉，《遊記》是他返日之後才整理，約於一九〇四年二月（甲辰正月）寫成。這日期早於羅斯福推論正式宣佈的日期。因此，若從此角度去看《遊記》中警惕國人的幾段話，我們實無法不佩服他在遊新大陸時的深刻觀察和洞見。

第三節 美國政府與托辣斯間的關係

其實，我們在《新民說》的前半部便可讀到梁啟超對帝國主義威脅的憂慮，只是那時梁氏擔憂的對象是擴張領土或屬地的「民族帝國主義」。他認為民族帝國主義是以「民族之漲力」為後盾的擴張行為，不同於古代帝國主義乃出於「一人之雄心」。到了〈論民族競爭之大勢〉一文，梁氏又進一步指出了美國帝國主義不同於幾個民族帝國主義國家之處。他說：

美國則專用籠絡手段，如列強競占勢力範圍，而美國不與聞；今次賠款，而美人矣所應得者還諸中國，是其例也。¹⁸

既然美國不要「勢力範圍」亦不要「賠款」，那麼，美國專用的「籠絡手段」所指為何？在該文中，梁氏認為「今日之競爭，不在腕力而在腦力；不在沙場，而在市場。」¹⁹他又稱：「美國商業進步之速，實為古來所未有。...其製鐵業之壯大，足以寒歐工之膽。自近世托辣士之制行，平準界之組織一變，世界之貨幣盡

者亞美利加人之亞美利加」，是其義也。及其變形，則所謂『亞美利加者美國人之亞美利加』矣。而孰知變本加厲日甚一日。自今以往，駸駸乎有『世界者美國人之世界』之意。而其所憑以為口實者，仍曰門羅主義。門羅主義？嘻，豈不異哉！」（《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59）

¹⁸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26。

¹⁹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26。

吸於美國紐約、芝加哥諸大市，遂為全地球金融之中心點，而平準大權，竟由歐而移於美。」²⁰ 因此，梁氏所稱的籠絡手段應是指資本的投資、貸款等，也就是指美國以強大的資本為後盾所進行的野心。²¹ 譬如，夏威夷在成為美國保護地之後，美國的資本及管理人員便進駐該島建立龐大的鳳梨和甘蔗工業。當夏威夷女王努力阻止該島快速美國化時，便被美國支持的叛亂力量推翻。²²

梁啟超知道美國進佔夏威夷的過程。²³ 因此，在美國逐漸取代歐洲國家成為新帝國之際，他提醒國人這個新帝國的侵略策略是「狐媚」不是「虎噬」²⁴。他擔心國人若不覺醒，將淪為歐美資本家的苦力。²⁵ 不過，在中國應有的對策方面，他此時卻仍因襲政治優先於經濟的觀點，認為只要建立民族國家，便有希望重建國人的「貨殖能力」。這時，他尚未對國人的經商能力失去信心，自然地也就將華商不振的現象全歸咎為民族受到打壓的結果。

到了新大陸後，他對於托辣斯的觀感起了不少的變化。首先，他發現托辣斯的勢力遠大於他的想像。當他來到紐約時，紐約給他最大的印象是他稱為「怪物」的托辣斯。²⁶ 然而，他對於托辣斯資本家的印象，似乎較托辣斯的商業勢力更為深刻。如果比較他會見金融業大托辣斯的摩根 (J. P. Morgan) 與美國羅斯福總

²⁰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21。

²¹ Palmer 與 Colton 認為：一八八〇年以來，西方帝國主義已不滿足於早期的土地併吞和市場與貿易點的建立，改以徹底地深入落後地區投資礦場、莊園、碼頭、倉庫、工廠、煉油廠、鐵路、河川、船隻、銀行，接管當地的生產事業，將當地人轉變成受雇於外傷得薪資員工。(Palmer 與 Colton, 1984, 中譯本：206)

²² Palmer 與 Colton, 1984, 中譯本：221。

²³ 〈夏威夷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194。

²⁴ 梁啟超說到：「野蠻國之滅人國也如虎，皮肉筋骨吞噬無餘，人咸畏之；文明國之滅人國也如狐，媚之蠱之，吸其精血，以療以死，人猶昵之。今各國之政策，皆狐也行，非虎行也。」(〈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32)

²⁵ 梁氏說到：「...若是乎，吾中國人真無以自存也人。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政，不及一紀，而十八省千百縣之地，勢必全為歐美資本家之領地。則夫此間之數萬萬人，所恃以瞻饗餐而資事畜者，唯有鬻身入苙，充某製造廠之工匠、某洋行之肩挑、某鐵路公司之驛卒、某礦物公司之礦丁、某輪船公司之水手；其最上者，則為通事焉、為工頭焉、為買辦焉，至尊矣、至榮矣、蔑以加矣。」(〈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34)

²⁶ 梁啟超對紐約托辣斯的印象是：「此怪物者，產於紐約而其勢力及於全美國，且駸駸乎及於全世界。質而言之，則此怪物者，其勢力遠駕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第一而上之者，二十世紀唯一之主權體也。吾欲考求其真相也有年，今至紐約，而始得此機。」(《遊記》，《專集》，第二十

統的過程，我們便不難瞭解他會藉德皇威廉第二的話稱「吾見當世英雄，惟有一人，曰摩爾根」。²⁷ 在《遊記》中，他更用了不少篇幅討論建立全美最大托辣斯的摩根 (J. P. Morgan) 和建立大北鐵路公司的占士比兒 (James Hill)，並預期這些公司的發展將不會僅限於國內，而是「自今以往且由國內托辣斯進為國際托辣斯，而受害最劇者，必在我中國。」²⁸ 遊美之後，梁氏整理這期間的觀察，寫了〈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一文，預測「二十世紀之世界，商戰之世界也」²⁹，並明白地肯定托辣斯的地位已是「生計界之帝國主義，...不及十年，將披靡於我國中」。³⁰ 他認為以托辣斯為主導的商業帝國主義是民族帝國主義的新發展，是西方國家資本累積過度的必然結果，屬於「天演理勢」、「終非人事所能逆抗也」³¹。美國由於「國民營業心最盛，而其民無論作何事業皆喜新奇、喜雄大」，故能讓天演理勢能較其他西方國家先發展。雖然美國當時還僅在「國內托辣斯」的階段，但梁氏預期它必然會發展成「國際托辣斯」，步上十九世紀民族帝國主義的向外擴張途徑。

其次，他在新大陸看出了美國羅斯福總統的企圖：以強化的聯邦政府權力將托辣斯併入管理。在遊新大陸之前，梁氏猶視托辣斯為西方資本社會的新生弊端，認為其政治家們正在圖解決之道³²；之後，他改變了觀點。不論在《遊記》或在〈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中，他都不耐其煩地說明美國政府政策由禁止轉為管理的整個過程。³³ 這個龐大的商業力量一旦結合強大的軍事力量，一個嶄

二冊：16)

²⁷ 《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44。

²⁸ 《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26。

²⁹ 《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101。

³⁰ 〈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文集》，第十四冊：61。

³¹ 〈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文集》，第十四冊：60。

³² 梁啟超認為：「自托辣斯特之風行，而小製造廠、小公司亦無以自立矣。自今以往，五大洲物產人力之菁英，最為將少數之大資本家所吸集。至此外之多數者，亦非必迫之使為餓殍也。要之，苟非搖尾蒲伏於大資本家之膝下，絕不能以自存。此實未來之黑暗世界，前途之恐怖時代，稍有識者所能見也。夫在歐美方盛之國，猶且以此問題日夜絞政治家、學問家之腦髓，而未知所以救。」（〈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文集》，第十冊：33）

³³ 譬如，他說道：「托辣斯之初出也，全國視為怪物、視為妖魔，政府務所以催抑掃除之。...

新型態的帝國主義也就呼之欲出了。³⁴

至此，我們不免要懷疑：這個新興的商業帝國主義是否即將入侵中國？還是這只是梁啟超個人的過度憂慮？若就史實言，美國除了於一八九九年宣佈「關於中國之門戶開放主義」的海約翰通牒，以及趁義和團之亂時派兵參與八國聯軍外，並未進一步介入中國事務。然而，這並不能否定羅斯福沒有干涉中國的野心，也無法斷言梁啟超是杞人憂天。邏輯上，如果門羅主義會發展出羅斯福推論，那麼，海約翰通牒也可能發展成干涉中國事務的某種新推論。³⁵

第四節 梁氏對抗商業帝國主義的策略

在對抗帝國主義的態度上，梁啟超是傾向於依時勢而選擇手段。當他區別古代帝國主義與近代民族帝國主義之後，他認為中國只要「恃一二之英雄以相敵」即可抵抗古代帝國主義；但對於民族帝國主義，則認為中國唯有「行民族主義之一策」以對抗。³⁶ 其後，當他感受到「今日之民德、民智、民力」都甚為低落，絕不是「今日變一法、明日易一人」就能振興民族時，便提倡「新民說」，企圖從建立公德、自由、權利、進取冒險、國家等新思想開始，去重塑整個民族的素

然卒不可禁。民間之組織托辣斯者，易其名而用其實，而發達且日盛一日。...由於天演理勢相迫使然，愈遏之則其勢愈盛，而弊愈深。於是禁遏之政策一變為補救之政策，而托拉斯之機體乃漸確立矣。」（《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24-25）

³⁴ 想到這個新帝國主義不出十年即將排山而來而國人卻還渾然無知，梁氏著急地發出第四度警訊：「美國之托辣斯亦由生產過度之結果也，其帝國主義又托辣斯成立以來資本過度之結果也，皆所謂不得已者也。雖欲禦之，烏從而禦之？嗚呼！君子關於此，而知美國進取之方略，必不徒以區區之古巴、夏威夷、菲律賓自盡焉矣。...吾介紹托辣斯於我國，吾有餘痛焉耳！」（《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文集》，第十四冊：61）

³⁵ 在《遊記》中，梁啟超以極憤怒的語氣描述美國取得巴拿馬運河的霸道，更指責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國際上用語其傲慢無禮，至是而極」。同時，他也強調：「公法不可恃，所恃者，為赤血耳、為黑鐵耳。」（《遊記》，《專集》，第二十二冊：103）

³⁶ 梁啟超說到：「昔者有若亞歷山大、有若查理曼、有若成吉思汗、有若拿破侖，皆嘗報雄圖、務遠略，欲蹂躪大地、吞併弱亡。彼則由於一人之雄心，此則由於民族之漲力；彼則為權威之所役，此則為時勢之所驅。...今日欲抵當列強之民族帝國主義，以挽浩劫而拯生靈，惟有我行民族主義之一策。」（《新民說》，《專集》，第四冊：4-5）

質。此時，他堅信「欲實行民族主義於中國，舍新民末由」³⁷。於是，順著他的權變態度推估，當商業帝國主義所取代了民族帝國主義之後，梁氏的「新策略」將為何？由於這涉及梁氏對經濟自由的態度，我們得就此先略加討論。

早在一八九七年寫〈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時，梁啓超便特別注意西方國家富民強國的手段。當他論及西方正蓬勃發展的生計學（經濟學）時，曾感慨「彼族之富強，洵有由哉！」³⁸ 在他看來，一隊隊的西方商人來到中國開拓市場，雖然仰仗帝國的軍力，但真正的武器則是其強大的商品生產能力。要對抗西方的民族帝國主義，中國必須提升商品的生產能力，並培養出一隊隊的精練商人。他接受亞當史密斯的主張，認為「經濟自由」是提升生產能力的最佳策略。著眼於此，梁啓超將司馬遷的「善者因之」解釋成經濟自由下的分工利益³⁹，並借用周易的「日中爲市，通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去說明自由通商的成就。⁴⁰ 爲了扭轉中國歷史上輕視商人與鄙視經商致富的傳統觀念，他提出「周禮有保富之義」，說明富商對國家的諸多利益。同時，他也借用司馬遷的「善者因之、其次利之、其次教誨、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強調經濟自由是優於政府干涉的政策。⁴¹

到了一九〇二年底，梁啓超對於經濟自由的態度略呈混亂。在《新民說》前段，他對亞當史密斯的觀點仍是接受多於排斥⁴²。不過，在〈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一文中，他則將亞當史密斯攻擊政府干涉的論點解釋爲「審其時、衡其勢」

³⁷ 《新民說》，《專集》，第四冊：5。。

³⁸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文集》，第二冊：35-36。

³⁹ 梁啓超說到：「如有數事於此，以一人分數日任之，則成就必鈍而窳；以數人分一日任之，則成就必速而良，此亦貴能因也。」（〈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文集》，第二冊：38）

⁴⁰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文集》，第二冊：40。

⁴¹ 在寫〈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時，梁啓超尚接受康有爲的三世學說，故亦不認爲當前真能施行「因之」政策，因此，他也同意政府仍可退而採取「利之、教誨」的作爲以助商業進行。在未達太平世之前，「道路阻於轉運、或關稅互生區別」而導致「商之不通」；若政府能去除道路與關稅的障礙，則經由商人之不斷地「觀時變」並將貨物運轉至各地，各地商品價格便能趨於平穩，乃至於使「倏忽幻異、波譎雲詭者，皆歸消滅也」。（〈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文集》，第二冊：45）

⁴² 譬如在〈論生利分利〉一節中，他便說到：「斯密亞丹以爲官吏爲分利，後人糾之詳矣。雖然若中國之官吏，則無論爲勞力者、不勞力者，而皆不得不謂之分利。」（《新民說》，《專集》，第四冊：90）

的主張，並堅稱適用於西方的經濟自由政策未必能適用於中國。⁴³ 反之，中國應該採取法國哥巴 (J.-B. Colbert) 與英國克林威爾 (Oliver Cromwell) 所曾採行的重商主義政策。這時，我們已可以看出他對經濟自由態度的轉變。由於他在《新民說》的前段已對民族的政治能力失去信心，自然會接著懷疑：一個能力普遍低落的民族，又怎可能在自由競爭的環境下建立起強盛的國家？不過，他這時仍堅信競爭，認為競爭的社會才可能保有文明與進步。⁴⁴ 因此，我們不難體會他這時內心的掙扎：雖然中國民族已經普遍喪失政治能力，但一個國家總有還幾個菁英份子，為何不讓他們出來掌舵？但是，要如何才能同時保有自由競爭與菁英政治？

到了新大陸，梁啟超除了進一步對華人的經營能力失去信心外，也瞭解托辣斯在結合龐大資本之後所表現出來的規模經濟。他這時已經確定：若任憑個人經營能力的發展，中國絕無法在亡國之前來得及形成足以對抗托辣斯的大企業。於是，他轉向有計劃的管理方式，指望由菁英份子領導的專制政府發揮加速大企業的形成效果。由於梁啟超堅信競爭，因此，即使他主張開明專制，也不致於贊同政府在經濟政策上採取社會計劃或商業壟斷的方式。反之，政府的角色應在於輔助國人的經營和競爭能力的提升。他認為中國這時的處境像極了兩千年前的齊國，而管仲治齊的辦法則是當前中國的唯一出路。

梁啟超在《管子傳》中指出：當管子相齊時，齊國只是一個「危亂岌岌不可終日」的弱國。不過，管子並不在意這樣的情勢，仍然處處「以帝國主義為政略」⁴⁵，憑自信心建立開明專制，終而讓齊國強盛起來。⁴⁶ 在該文起頭處，梁

⁴³ 梁啟超這時認為：「斯密（即亞當史密斯）之言，蓋針對歐洲當時治體而言也。彼時承重商主義極盛之後，各國政府專以干涉為政策。干涉之弊，民失其情，勿失其理。...若我中國，則政府之與民業，向來莫不相關切。以云自由，則中國民之自由極矣。...非治今日中國之良藥也。...況乎今日帝國主義日行，各國之民業，皆以政府為後盾，以出其競於世界。」（〈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文集》，第二冊：62）

⁴⁴ 《新民說》，《專集》，第四冊：18。

⁴⁵ 《管子傳》，《專集》，第二十八冊：9。

⁴⁶ 在《開明專制傳》中，梁啟超將管子列為古今中外專制政體中最成功的政治家。

氏提出五點西方國家雄霸天下的思想：國家思想、法治思想、地方制度、經濟競爭、帝國主義，然後指稱管子不僅熟知此五點道理，更成功地實行過。⁴⁷ 當前的弱中國就像管子相齊之初的弱齊國，只要行管子之術，便有望成爲管子爲相之後的齊帝國。

這樣的對比並不完全，因爲西方國家雖能成爲帝國，卻無力解決社會的不齊現象。相對地，梁氏認爲管子卻讓齊帝國同時達到均與富的目標。在遊新大陸之時，他相當留意美國解決社會不齊的策略。然而，他卻只看到社會主義者的集體生活實驗，把競爭隨同資本主義一齊拋棄，以犧牲進步作爲換取社會平均的代價。這自然不是梁氏所能接受的救亡圖存之道。

反過來看看管子，梁啓超覺得西方的政治家不如管子甚遠，因爲管子能在獎勵生產之時調劑分配。⁴⁸ 在管子的諸多經濟政策中，他認爲幣制金融政策是齊國能同時實現均與富的基石。他說：

抑制強豪兼併之術，往往有禁民之貸金取息者，亦有以法律限息率不許過高者。...善謀國者不爲此下愚之策，惟設法以立完備之金融機關，使一國現有之資金流通捷而效力增，而將來之資本緣而增值。...管子則深明此義者也。故民之貸金取息者，非惟不禁且獎勵之；而取息多寡，亦未嘗一爲干涉，惟將金融之樞紐握諸政府，使民之欲貸者，不必仰息於豪強，而政府則隨時以既齊困。⁴⁹

在這一段話中，梁啓超清楚地指出：管子一方面允許民間資金自由借貸，另一方面則提供政府貸款來和民間資金競爭。政府的介入可以避免貧民慘遭富豪的高利貸壓榨，但則必須遵守市場法則，否則民間富豪也會在不平等的競爭下被迫退出市場。反之，政府必須保有足夠的經營效率，否則也會慘遭民間的淘汰。梁啓超認爲管子這種金融政策，不但讓資金自由流通、有效利用，又成功地解決社會不

⁴⁷ 《管子傳》，《專集》，第二十八冊：1。

⁴⁸ 《管子傳》，《專集》，第二十八冊：24。

⁴⁹ 《管子傳》，《專集》，第二十八冊：63。

齊的難題。⁵⁰

第五節 檢證與結論

至此，我們強調：梁啓超在遊新大陸之前，已對早期接受的經濟自由觀點逐漸失去興趣。到了美國之後，他更加相信中國人已經普遍失去政治能力與經營能力。當他看到羅斯福總統積極以中央集權去管理美國新興托拉斯的龐大資本能力時，毫無懷疑地認為中國必須採取開明專制，才可能對抗此新興的商業帝國主義。不過，他在新大陸也看到托辣斯所導致的社會不齊問題，以及試圖去解決這問題的社會主義。梁氏認為社會主義是以進步為代價去追求平均，並不適於迫切需要進步的中國。反之，他在中國歷史上發現管子的幣制金融策略，認為管子不但振興了齊國，也同時避免了社會不齊的現象。他也強調：管子的以幣制金融政策類似於現代的銀行政策。⁵¹

梁啓超在一九〇三年的轉變雖然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但我們相信，真正的關鍵因素在於他對於帝國主義本質之瞭解的轉變。在此之前，他看到西方民族帝國主義結合軍事與商品生產能力的入侵，但在新大陸看到托辣斯之後，他發現托辣斯的資本勢力已經凌駕於帝國的軍事勢力之上。帝國主義侵略的形態已由以軍事佔領為後盾的市場壟斷發展為以資本投資為前導的全面性政經控制。梁氏提出的相應對策，可以說是從強調商品的生產能力轉為強調資本的利用。一九〇三年以後，梁啓超的政治態度雖然還曾多次在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共和民主之間轉軌；⁵² 但就經濟思想而言，他強調資本能力的觀點並未曾再改變。⁵³ 因此，我

⁵⁰ 梁啓超在〈開明專制論〉中還為君主立憲辯解；但到了《管子傳》，他已不再辯解，而專注於經濟政策面的討論。若細讀此書，我們感覺到他寫該書時所持的態度：不論政體是共和或立憲，管子的開明專制政策都是最佳的可行辦法。

⁵¹ 梁啓超認為管子當時所採行金融政策，「即此今世銀行所盡之職務也。」（《管子傳》，《專集》，第二十八冊：63。）

⁵² 蕭公權認為梁啓超在光緒三十三年時「言論又為之一變」，由主張開明專制轉為支持君主立

們可以大膽**假設**：在一九〇三年之後，梁啓超便視經濟政策的選擇優於政治體制的選擇。也就是說，他雖仍偏愛開明專制，但偏愛不是不可調整的。只要能發展資本與大企業，政體的差異其實並不是那麼重要。如果加上變更政體必須付出的動亂與浮躁，那麼，過於堅持政體的固定形式倒反會傷害資本與大企業的發展。

爲了說明上述的假設符合梁啓超在一九〇三年以後的思路，底下我們將以他於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間在袁世凱總統下擔任司法總長（熊希齡內閣）及貨幣局總裁所採行的幣制金融政策，以及於一九一七年在馮國璋代理總統下擔任財政總長（段祺瑞內閣）的政策計劃，作爲檢證這一假設的資料。

一九一三年九月，梁啓超擔任熊希齡內閣的司法總長，並草擬〈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該宣言書在經國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成爲熊內閣的施政方針。在政治方面，該方針計劃建立責任內閣、司法獨立、地方自治等法治制度；在經濟方面，主張對外採取保護主義和開放主義結合的政策，對內不採取壟斷主義、不與民爭利，鼓勵和獎勵民族資本主義企業。⁵⁴ 十月，袁世凱任正式大總統，開始毫不掩飾實踐其獨裁專制的野心，接連著解散國會、停辦地方自治、阻礙財政運作。次年二月，梁氏辭職，並說到：「大政方針本出自予一人之手，前之不忍去者，實待政策之實行，今已絕望，理應辭職。」⁵⁵

三月，梁氏接任貨幣局總裁一職。他認爲只要袁氏能行開明專制，則國家大政仍有轉圜空間。在任上，他先後發表〈整理濫發紙幣與利用公債〉、〈銀行制度之建立〉、〈擬採國民銀行以整頓商票維持金融辦法〉、〈擬整頓東三省紙幣辦法大綱〉、〈擬發行國幣匯兌券說帖〉等文。然而，袁氏畢竟是要行獨裁專制，而不是梁氏理想中的開明專制。年底，他不得不再請辭。

憲，到了宣統三年，又轉而支持共和。（蕭公權，1982，801-802）

⁵³ 楊肅獻認爲梁啓超的民族思想到了一九〇三年下半年以後，「才發展到完全的階段」（楊肅獻，1982：128）。如果「完全」意味著不再改變，那麼楊文的觀點與本文則相近。就本文言，由於梁啓超此時已看出商業資本主義的本質，而托辣斯正處於發達時期，一直到梁氏晚年都未再出現新的發展，因此，他的民族主義與對抗商業帝國主義的政策也就定型在一九〇三年。

⁵⁴ 李喜所、元青，1993：322。

⁵⁵ 梁氏之語，轉摘自李喜所、元青（1993：326）。

一九一七年七月，梁啓超擔任段祺瑞內閣的財政總長。他提出「改革幣制、整頓金融」的八字方針⁵⁶，並計劃把諸國暫緩中國償付的一千三百多萬元庚子賠款及計劃向日本貸款一千五百萬元，作為在國內發行五千萬元公債的準備金，以徹底進行幣制改革、整頓金融。然而，段琪瑞政府的軍費支出急劇增加，國庫虧欠六千多萬元，迫使梁氏不得不將全數的一千三百多萬元充作軍費。梁氏的改革理想因而破滅。之後，他轉為追求政府財政收支的平衡，也同樣因無法控制軍費支出而宣告失敗。十月，梁啓超提出辭呈，並於十一月隨內閣總辭而離職。⁵⁷

如前所述，當梁啓超認識到帝國主義侵略方式的轉變之後，開始重視幣制金融制度的改革。於是，當他有機會入閣時，自然全力進行幣制金融制度的改革。這點，他在加入熊內閣之際便曾明白地說到：

自吾居東時，好扼腕論天下事，輒以為中國救亡圖強之第一義，莫先于整理貨幣、流通金融，謂財政樞機于茲焉麗，國民生計命脈于茲焉托也。⁵⁸

值得我們注意地，相同一整套的發展資本主義、改善財政、繁榮經濟計劃，他不僅在追求責任內閣的熊希齡內閣下提出，也在進行專制統治的袁世凱政權下時提出，更在北洋政府的段琪瑞政府下提出。雖然實際的政體一再變遷，而他對於政體的態度也再三轉變，但是，他強調幣制金融改革的重要性及改革方式卻未再改變。因此，從梁氏三次入閣所提的政策計劃中，我們無法拒絕或否定前面的假設：自從一九〇三年的轉變之後，梁啓超便以為中國的救亡圖存必須依賴國人經營能力的重建和資本的加速累積，因此，也就視經濟政策的選擇優先於政治體制的選擇。

⁵⁶ 李喜所、元青，1993：430。

⁵⁷ 李喜所、元青，1993：十五章。

⁵⁸ 見梁啓超的〈余之幣制金融政策〉一文。本處間接摘自李喜所、元青（1993：331）。

參考文獻：

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北京：中華書局。

〈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二冊》。

〈政府大政方針宣言書〉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四冊》。

〈余之幣制金融政策〉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四冊》。

〈論民族競爭之大勢〉，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十冊》。

〈生計學學說沿革小史〉，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十二冊》。

〈二十世紀之巨靈托辣斯〉，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十四冊》。

《開明專制論》，收於《飲冰室合集》之《文集第十七冊》。

《管子傳》，收於《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二十八冊》。

《新民說》，收於《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四冊》。

《新大陸遊記》，收於《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二十二冊》。

〈夏威夷遊記〉，收於《飲冰室合集》之《專集第二十二冊》。

元冰峰 (1966)，《清末革命與君憲的爭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宇平 (1991)，〈試論梁啟超的反通貨膨脹言論〉，《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十期。183-199 頁。

李喜所、元青 (1993)，《梁啟超傳》。北京：人民出版社。

黃克武 (1994)，《一個被放棄的選擇：梁啟超調適思想之研究》。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朋園 (1964)，《梁啟超與清季革命》。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張朋園 (1997)，〈研究生生活的回顧--從梁啟超到現代化〉，《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第二十三期。33-42 頁。

劉紀曜 (1995)，〈梁啟超的自由理念〉，《國立師範大學歷史學報》，第二十三期。263-287 頁。

- 張灝 (1980), 〈改革與革命：梁啟超對政治和傳統的態度〉, 收於《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周陽山、楊肅獻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31-145 頁。
- 趙靖、易夢虹 (1980), 《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 下冊。北京：中華書局。
- 楊肅獻 (1980), 〈梁啟超與中國近代民族主義〉, 收於《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民族主義》(周陽山、楊肅獻編)。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09-129 頁。
- 蕭公權 (1982), 《中國政治思想史》。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潘英 (1988), 《革命與立憲》。臺北：谷風出版社。
- Chang, Hao (1971), *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Dewey, John (1927), "Imperialism is Easy," *The New Republic* 50, (March 23).
- Ely, James W., Jr. (1995), *The Chief Justiceship of Melville W. Fuller, 1888-1910*. South Carolin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 Palmer, Robert R. and Joel Colton (1984),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中文譯本：孫小魯譯, 《現代世界史》, 台北：五南圖書公司。)
- Trescott, Paul B. and Zhaoping Wang (1994), "Liang Chi-Chao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Economic Ideas into China,"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16, 126-145.

梁啟超對抗帝國主義策略的轉變

黃春興^{*}

1997/10/15

關鍵詞

梁啟超、新大陸遊記、托辣斯、帝國主義、開明專制、管子

^{*} 本文作者現為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副教授。作者感謝干學平、賴建誠兩位教授對本文初稿時給予的寶貴意見；然而，本文任何誤謬仍屬作者個人的責任。作者通訊地址：新竹市光復路國立清華大學經濟系。網路：cshwang@faculty.nthu.edu.tw、電話：(03)-5742890、傳真：(03)-5722476